

# 明末士子的时文选评与声名传播 ——以张溥等《国表》系列书籍为中心

郭英德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崇祯元年至八年(1628—1634),张溥(1602—1641)等编订时文选本《国表》,先后推出四集,连同《国表小品》,构成《国表》系列书籍。无论是从选录的人数、篇数来看,还是从传播的广度、深度来看,这一系列书籍都足以作为士子“社稿”的典范,引导我们走进明末士子时文选评和声名传播的历史现场,审视他们的文化活动与文化风貌。深入考察张溥等《国表》系列书籍的选评者、选评标准与传播效应的基本特征,从一个方面展现了明末士子的时文选评活动及其社会文化功能。

**关键词:**时文;士子;选本;复社;张溥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8)05-0009-10

## 一、引言

明人语境中的“时文”,概称当代各种科举考试文体的文章,即所谓“举业文章”,包括四书义、经义、论、策、表、判等<sup>①</sup>。在明代,由民间而非官方主持编选、刊刻当代时文,至少始于成化年间(1465—1487)的杭州通判沈澄编刻的《京华日抄》<sup>[1]</sup>。至明末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民间编刻的时文选本,无论是选录中式举人、进士时文的“程墨”“房书”“行卷”,还是“诸生征文汇选”的“社稿”<sup>②</sup>,莫不充斥坊间,遍及天下<sup>③</sup>。

在汗牛充栋的时文选本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诸生征文汇选”的“社稿”。这是因为,明代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肄业的士子,包括附生、增生、廪生、贡生等,通称生员<sup>④</sup>,数量极其庞大。尤其明中期以后,生员额急剧增加。据顾炎武(1613—1682)估算,“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sup>[2]</sup>。如此庞大的生员队伍,再加上数量更为庞大的未入学的童生,每年撰写数以万计的时文,经由

各地文社“以文会友”的活动,选编品评,刊行传布,这的确堪称明末出版界、文化界的一大奇观。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中,崇祯元年至八年(1628—1634),太仓(今属江苏苏州)士子张溥(1602—1641)、金坛(今属江苏常州)士子周钟(?—1645)等精诚合作,编订了大型时文选本《国表》,先后推出四集,连同《国表小品》一书,构成《国表》系列书籍。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上说:

天如(张溥)于是哀十五国之文而詮次之,目其集为《国表》,受先作序冠弁首。集中详列姓氏,以示门墙之峻;分注郡邑,以见声气之广云。……按目计之,得七百余入,从来社籍,未有若是之众者;计文二千五百余首,从来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者。<sup>⑤</sup>

无论是从选录的人数、篇数来看,还是从传播的广度、深度来看,《国表》系列书籍都足以作为士子“社稿”的典范,引导我们走进明末士子时文选评和声名传播的历史现场,审视他们的文化活动与文化风貌。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畅销书籍、实用书籍易生易灭,《国表》系列书籍早已全部亡佚。现存的史料,只有相关的序言、凡例,如张溥《国表序》《国表序(代张受先)》《国表小品序》《国表四选序》<sup>⑥</sup>,罗万藻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14ZDB066)

**作者简介:**郭英德(1954—),男,福建晋江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出版《探寻中国趣味——中国古代文学之历史文化思考》《明清传奇史》等学术著作26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论文260多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等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等10余项;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戏曲、中国古代文化

(?—1647)《国表序》<sup>[3]</sup>, 罗明祖(1600—1643)《复社国表选例》等<sup>[4]</sup>, 以及吴伟业(1609—1672)《复社纪事》<sup>[5]</sup>、眉史氏《复社纪略》、杜登春《社事始末》<sup>[6]</sup>等笔记杂著中的相关记载, 为今人留下《国表》系列书籍的若干历史踪迹。

因此, 在20世纪,《国表》系列书籍一直未能进入文史研究者的学术视野,直到近20年,方有一些研究成果,如莫真宝、丁国祥、王恩俊、王伟、郑永慧等人的论著,论述《国表》系列书籍的编纂与功能<sup>⑦</sup>。但是,有关《国表》系列书籍的一些重要问题仍有待发覆。例如,同明中期以来时文选本的选评者相比较,《国表》系列书籍选评者的社会身份有何特征?这种身份特征如何制约与影响他们的时文选评活动?《国表》系列书籍的选评标准与明末文风的形成与变迁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国表》系列书籍的选评与传播与明末士子社会声誉的获取与群体意识的形成又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深入考察张溥等《国表》系列书籍的选评者、选评标准与传播效应,从一个方面展现明末士子的时文选评活动及其社会文化功能。

## 二、“集同人之文而进退之”:《国表》系列书籍的选评者

明崇祯元年(1628),熊开元(1599—1676)调任吴江(今属江苏苏州)知县,慕张溥之名,请至吴江邑馆,授徒讲艺<sup>⑧</sup>。熊开元在政事之余,“主斯文之选”(张溥《国表序(代张受先)》),命本县士子孙淳、吴鼐(1608—1655)、沈应瑞等“聚四方之业”,由张溥、周鍾等“左右其政”(均见张溥《国表序》),加以遴选、点评,编成《国表》初集。此集当为孙淳等人“始创”或“肇举”的“旧复社”的“社稿”<sup>⑨</sup>,而所选评时文的作者,自当以熊开元在吴江简拔的士子为主<sup>⑩</sup>。

崇祯二年(1629)初,《国表》初集刊刻并流传,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sup>⑪</sup>。“《国表》之文,天下之所予也”(张溥《国表小品序》),得到文坛的普遍赞誉,大江南北的士子如水之赴壑,纷纷投寄时文,希望名列《国表》。吴伟业记载:“于是臭味翕集,远自楚之蕲、黄,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宁国,浙东之山阴、四明,轮蹄日至。秦、晋、闽、广间,多有以其文邮致者。先生(张溥)丹铅上下,人人各尽其意,高誉隆洽,沾丐远近矣。”<sup>⑫</sup>因为“文之往来,日益浩大,取之不胜其取”(张溥《国表小品序》),于是由熊开元倡议,张溥偕同王启荣、吕云孚(1611—1645)等,先行编选《国表小品》<sup>⑬</sup>,约

刊刻于此年春。

这年九、十月间,在熊开元的支持下,杨廷枢(1595—1647)、张溥等人在尹山(今江苏苏州市东南)举行“新复社”成立大会<sup>⑭</sup>。会后,由张溥、周鍾等“约四方之文,各本其师、因其处”(张溥《国表四选序》),在当年冬季,编选刊刻《国表二集》,成为“新复社”的“社稿”<sup>⑮</sup>。

崇祯三年(1630)张溥中举,次年(1631)中进士,在北京候选。同年,熊开元擢为吏科给事中,赴京城。而《国表》诸集的影响在社会上持续发酵,于是由周鍾等人继续主持复社士子的时文选评,编纂《国表三集》(又称《国表三选》),大约刻于崇祯五年(1632)<sup>⑯</sup>。

这年冬天,张溥以葬亲为由,乞假归乡,不复仕进。次年(1633)春三月,张溥主盟复社虎丘大会,盛况空前<sup>[7-8]</sup>。而孙淳等人历年“经营社事,积久不衰”,广泛收罗南北各地社中士子时文,乃至“同人诸篇归其家者,岁可十万”(张溥《国表四选序》)。于是在崇祯七、八年(1634—1635)间,由周鍾和广东士子黎遂球(1602—1646)主持,孙淳等人辅助,对这些时文加以遴选评定,编成《国表四集》(又称《国表四选》)<sup>⑰</sup>。

综合张溥为《国表》诸集撰写的序文,先后参与该系列书籍遴选评定的士子有数十人,包括张溥、周鍾(字介生)、孙淳(字孟朴)、吴鼐(字扶九)、沈应瑞(字圣符)、周立勋(1597—1639,字勒卣)、钱旃(1597—1647,字彦林)、朱隗(字云子)、杨廷枢(字维斗)、杨彝(1583—1661,字子常)、顾梦麟(1585—1653,字麟士)、王启荣(字惠常)、吕云孚(字石香)、夏允彝(1596—1645,字彝仲)、杜麟徵(字仁趾)、吴昌时(?—1643,字来之)、沈寿民(1607—1675,字眉生)、沈士柱(?—1659,字昆铜)、刘城(1598—1650,字伯宗)、吴应箕(1594—1645,字次尾)、万应隆(1599?—1669?,字道吉)、陈际泰(1567—1641,字大士)、罗万藻(字文正)、陈弘绪(1597—1665,字士业)、章世纯(1575—1644,字大力)、易道暹(?—1635,字曦侯)、陈肇曾(1602?—?,字昌基)、陈元纶(?—1646,字道掌)、陈燕翊(字仲谋)、宋继澄(1594—1676,字澄岚)等。

这些选评者分别来自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山东等不同地区,而当他们参与《国表》系列书籍的时文选评时,却有一个共同的社会身份,即大都是未入仕途的生员或举人。正如张溥所说的:“选文固书生事也。”(卷一八《受先房书选序》,页346)

例如张采(1596—1648)与张溥为生员时,志趣相投,情逾手足,多年同案研习时文<sup>[9]</sup>,天启四、五年间(1624—1625)曾一起创办应社,并合作编选时文选

本《名文匡选》<sup>[10-11]</sup>。但是，崇祯元年(1628)张采中进士，并于十一月赴临川知县任，因此编选《国表》初集、二集时，他并未列名选评者。张采《具陈复社本末疏》称：“若复社之起，臣已为县令，不预书生事。张溥时犹未第，故选社文，以臣向同砚席，代臣作序。”<sup>[12]</sup>

再如张溥于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于是就不再继续列名《国表》三集、四集的选评者。而周鍾虽然在崇祯元年(1628)八月与张溥一起以明经贡入太学，但他却屡试不第，直到十六年(1643)才中进士。因此他得以“名诸生”的身份，一直主持选评《国表》三集和四集。

既然这些选评者大都是未入仕途的生员或举人，那么，他们凭借什么样的“文化资本”，居然能够操纵时文选政，主持海内“诸生征文汇选”，并且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广泛呢？

第一，《国表》系列书籍的选评者大都具有高超的时文写作能力和水平，并且得到社会公认。

陈际泰的时文写作和时文批评，在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名重一时。他的同乡罗万藻说：“大士才誉震海内者数十年，鸿裁健制之儒，愿托文字者，何可胜数。”<sup>[13]</sup>吴伟业《复社纪事》也说：“自制举艺之法行，其撰著之富，单行可传，无如临川陈大士际泰。”<sup>[5](599)</sup>

杨彝和顾梦麟也以擅长时文著称于世，汪琬(1624—1691)记载道：“两先生亲善，皆明经饬行，矜尚气节，每试各占高等，时人并称‘杨、顾’云。……明万历、天启末，士之为时文者，喜倡新说，畔违传注。两先生慨然思振其弊，相与讲说辨难，力明先儒之学。远近受经门下称弟子者，尝不下数百人。”<sup>[14]</sup>

周鍾的时文写作更是享誉一时，曾雄踞文坛三十年，“以制艺甲乙天下”<sup>[5](599)</sup>。张溥评价说：“介生为天下师表，十余年来，晦明穷达，涉历最长，不婴其念，与之交者，望其粥粥，益深自下。予昔之见介生与今之见介生，固犹是也，其为学问，则从此远矣。远方之士，间一过从，予必语之曰：‘君当见介生。’何则？见介生，然后知名士之非奇，中庸之莫及也。”(《国表四选序》)

第二，《国表》系列书籍的选评者都积极参加文社活动，互为师友，广纳门生，研习时艺，具有极为丰富的“人脉”。明泰昌、天启、崇祯年间，士人结社趋于极盛，尤其是文社更如雨后春笋<sup>[15]</sup>。而《国表》系列书籍的选评者也无不缔结文社，谈文课艺，形成错综复杂的“朋友圈”。

例如江西豫章陈际泰、章大力、罗万藻等，早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即结文社，到泰昌元年(1620)前

后，形成新城大社，“区区斗城之内，人鲜而士多，遂杰焉，与四海之英尊奢相角，而往往胜之”<sup>[16]</sup>。

再如天启四年(1624)，张溥、张采、周鍾与杨彝、顾梦麟、杨廷枢等相约，于常熟唐市共举应社，此即所谓“五经应社”，以年龄推杨彝为长<sup>[10,17]</sup>。其后周鍾、吴昌时等“谋推大之，迄于四海，于是有广应社”<sup>⑧</sup>。

又如天启六年(1626)，岭南士子黎遂球倡云合大社，“惟以华期令节，选胜地，征胜友，分题而散，散而汇文以聚，闭关下帷，月可一二出，乐相乐也”。不到一年，其规模发展到“几以百聚”，甚至有“出一言以号之中原”之势<sup>[18]</sup>。

第三，《国表》系列书籍的选评者大都有编纂时文选本的丰富经验，并拥有人数众多的作者群和读者群。文社与选文的关系，原本就极为密切。清康熙初吕留良(1629—1683)批评道：“凡社必选刻文字，以为囿媒。自周鍾、张溥、吴应箕、杨廷枢、钱禧、周立勋、陈子龙、徐孚远之属，皆以选文行天下，选与社例相为表里。”<sup>[19]</sup>

如天启三年癸亥(1623)，周鍾“《房选华锋》出，好尚一新，天下竞称之”。连对周鍾颇有非议的艾南英(1583—1646)，致书时也说：“今日制艺一道，赖兄主持，真如日月之中天，万物皆睹。”<sup>[7](624)</sup>

天启四年(1624)应社建立后，“志于尊经复古”，于是“尽一社而请之”，发檄文，撰书序，向各地士子广为征集时文，张溥、张采、周鍾、杨彝、顾梦麟、杨廷枢、钱旗、吴昌时诸人分工合作，编定《五经征文》<sup>[17](129-130)</sup>。

又如杨廷枢于崇祯三年(1630)乡试第一，“领解之后，声誉日重，门下著录者二千人”<sup>[20]</sup>。他与钱禧(?—1644)辑评《皇明历朝四书程墨同文录》十五卷，所录时文，起自洪武十八年(1385)，终于崇祯七年(1634)，扉页书坊广告称：“是选评论极精，搜罗极广，剗剔极工。时昭代不朽之书，非时文比也。识者鉴之。”<sup>⑨</sup>

崇祯二年(1629)，杜麟徵与夏允彝编选刊行时文选本《幾社六子会义》。此书初刻时，“尘封坊间，未能大显”。至崇祯三年(1630)榜发，幾社士子陈子龙(1608—1647)、彭宾二人中举，“而江右、福建、湖广三省贾人，以重资请翻刻矣”<sup>[6](458)</sup>。而杜麟徵、夏允彝正是《国表》三集、四集的重要选评者。

当然，这些选评家的时文风格并不尽相同，甚而形成时文流派。崇祯初年，杨彝综论各地区时文流派，说：“一时风尚，高博推娄上，平正推金沙，幽奥推豫章，朴茂推莱阳，清真推江上，精锐推宛泾，圆转推上虞”，还有以杨彝为代表的唐市派<sup>[11]</sup>。黎遂球也说：“故制科之文，吾辈以名家立教，有所不辞。……十

数年来,有吴门、娄东、云间、金沙、江上、茗上、西湖、豫章、临川诸家,凡数十君者,山出岳立。余不及皆志其全,亦庶几足以尽东南之文派耳。”<sup>[21]</sup>

因此,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是什么样共同的选评标准,将这些不同时文流派的选评者维系在一起,共同编纂《国表》系列书籍呢?

### 三、“人无滥登,文无妄予”:《国表》系列书籍的选评标准

就其性质而言,《国表》系列书籍无疑是一种以科举考试为旨归的“同人”时文总集。张溥在表述熊开元主持编纂《国表》的初衷时说:“鱼山先生以政事之暇,加意今文,所谓应制之途,同人之义,出其中矣。”(《国表序》)“今文”即时文,“应制之途”即科举考试的路径,“同人之义”即士人群体的风范。

作为天启、崇祯年间士子时文写作的轨范,《国表》系列书籍的选评标准首先表现为坚持传统的道德指向,即入选士子必须“被人伦之誉”(张溥《国表小品序》),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持节守礼。熊开元在吴江考核士子时,便已确立了这一标准。他“正色讲义,遣遇人事,分科其间。凡被人伦之誉者,次第姓名,烂如可睹”(张溥《国表小品序》)。而张溥等人奉命“约四方之文”,选评《国表》初集,即严守这一标准:“凡以文至者,必书生乎,先乡党而次州邑,考声就实,不谋而同。是以人无滥登,文无妄予。”(张溥《国表四选序》)

《国表》初集的编纂,尚未有意识地强烈彰显文人社团的“群体意识”,正如张溥所说的:“《国表》之文,天下所予也,习其读而知其传,不必其人之与乎社也。”(《国表小品序》)尽管如此,以是否“被人伦之誉”作为士子能否入选《国表》一书的重要标准,这一点是绝不含糊的。张溥《国表小品序》记载了熊开元对这一选文标准的阐发:“文字之说,所以观行。小言之集,亦斯人所托途也。今使人张大论事,示所奇立,落落有概,而轻忽小节,忘其蕴藉,类为物所简贱之理,而不耻其不度,则天下亦无所杀其辞矣。”于是“诸子受其指,以严所品类”。正因为其文足以观其行,因此选文必先选人,“严所品类”成为选评时文的首要之举。

当然,面对来自各地的数以千百计的士子,要衡量其人品价值,并加以别择删汰,这的确难乎其难。选文者既不可高自位置,过于严厉,也不可过于宽松,“泛与谬取”,张溥认为,“二者固物之通害也”。于是他明确地强调:“出材之区,不一其处,别用之道,则

存乎人。……夫咏昔日之思贤,览今日之求友,即而称之,岂徒文字之谓乎?亦在斯人之伦,无乎不淑也。是故地有其人,人有其文,托于道路之远,告以君子之志,则与乎斯选者,人伦之行,无敢阙如己。”(《国表序》)

“先与乎其人,后与乎其文”<sup>[17](138)</sup>,重其人甚于重其文,这是张溥等人一以贯之的选文标准。如周鍾编选时文,即“主于接识人伦,正以圣人之事,而先使之就将高明,易于遵道遵路”<sup>[17](147)</sup>。张溥《易会序》说:“学《易》之家,不一其处,而难乎其人。有其人,然后有其文;无其人,则所谓有其文者,犹之乎无而已。”<sup>[17](146)</sup>《行卷玄笈序》说:“若夫士弗内淑而能选与著者,寡有之也。”<sup>[17](181)</sup>《程墨表经序》又说:“夫好奇则必知古,知古则必知经,知经则必知所以为人,至于知所为人而文已毕精矣。”<sup>[17](147)</sup>

也正因为强调“人伦之誉”,因此选评者就不止止于选文而已,还肩负起由其文而正其人的文化使命:“夫固知选之为言,去鄙登善,所为善,存乎文也。”(张溥《国表小品序》)张溥《诗经应社序》说:“为人之道,有一不及于正者,则辞之而不敢就。既与其人,而文或有未至者,则必申之以正,因其材之所命而乐其有成。是以邪辟之意无所形之于文,而四方之欲交此数人者,尝观其文而知其人之无伪,则定社之大指也。”<sup>[17](138)</sup>

因此,张溥特别称道孙淳搜罗《国表》诸集时文之功,说:“孟朴与扶九、圣符,经营社事,积久不衰。同人诸篇,归其家者,岁可十万。孟朴孜孜扬挖,一字不遗其意,谓‘言者心声,文乃道器。议论可以不彰,人文不可以不录。’”(《国表四选序》)刘城也强调复社时文选本的典范作用,说:“分别纤微,清疏雅正,仰钻圣贤之语意,按以高皇帝之尺度。其合焉者是之,表章之,以助为说于天下。苟其离焉,虽有司所矜重,举世所奔归,吾辨之,非之,正告之世,使承学之士心手有所戒。若是者,皆吾党皆能为之,皆有所不得已于其间。”<sup>[22]</sup>

当然,“被人伦之誉者”的时文,有佳作,亦有劣文,并非均可加以选录。《国表》系列书籍作为天启、崇祯年间士子“应制之途,同人之义”的轨范,其选评标准尚需因人及文,以倡导“古学”为时文典型,从而真正做到“人无滥登,文无妄予”。

还在天启初年,周鍾就提倡复兴五经,“要之古学,则已立矣”<sup>②</sup>。其后他们倡举应社,切磋举业,更明确标举“尊经复古”的为文宗旨,以救时文之弊<sup>[17](129,138)</sup>。崇祯四年(1631)前,张溥致书周立勋,批评当代士子沉溺时文,而经学荒芜,说:“当今经业埋颓,士鲜实

学，世所号为魁然者，咸取径时体，掇其不伦之辞，自名诡特。此种实未梦见诸子，何有六经？”又云：“尝观泝斯道，吾吴落落，自震川先生后，尚未有继。昌盛明业，事在吾党，应社诸人，便不宜自薄也。”<sup>[17](214)</sup>在天启、崇祯之际，时文弊端已日渐严重，壅塞了研治经学之途，因此必须大力倡导“尊经复古”的为文宗旨，借以扭转时风，救正时弊。

而在当时，倡导“尊经复古”的为文宗旨，最为便捷而有效的方式，就是遴选品评士子的时文作品，“与之以正，辞无杂越”（张溥《国表序（代张受先）》），标树时文典型，规范时文写作。黎遂球说：“神庙末年，科举之士目不知古书史为何物，士或偶一用古，闾中读之，至不可句乙。……其时则有娄东二张子采、溥，姑苏杨维斗，起而忧之。因征选时文之近古者，以为海内告式。又合江南北同声气之士，盟于吴门，人至以数千计，转相推引。”<sup>[23]</sup>在张溥等人的大力倡导下，“尊经复古”成为崇祯年间时文写作的主潮，滔滔滚滚，汹涌澎湃。罗万藻《张天如易选序》说：“天如辈操挈文章，正告天下以经术之从，十年之中，靡然向风矣。”<sup>[3](344)</sup>

正是以“尊经复古”为宗旨，张溥《刘伯宗房稿论文序》主张，选文应秉持“法严而指恕，有古者忠厚教人之遗风”的准则，因“其文之不可废也，然后表而著之”，既不可“溢美为工”，也不可“专讥示直”<sup>[17](245)</sup>。罗万藻《国表序》说：“诸君子所去取必严，屏列必慎，式于大雅。”<sup>[3](395)</sup>罗明祖《复社国表选例》也说：“评者，评其文而已，非评自评而文自文也。”从《复社国表选例》可以看出，《国表》对所选时文的评论有褒有贬，褒者如“选中非隋珠卞璞，不敢滥及。或冷致闲情，味蕴菽帛，容易误过，聊为拈破，会心不多，堪供徘徊而已”；贬者如“才高者不忌字句，意锐者无暇词章。或沿子风，或落謏藻，或过翻而碍理，或索巧而反拙，非故吹毛，只祈攻错”，“臆见旁附，敢辞续凫之讥”<sup>[24]</sup>。

再进一步看，天启、崇祯之际士子的时文写作，既有地域文风的区别，也有时代运会的流转，因此时文选本的选评标准，也不能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国表》系列书籍作为天启、崇祯年间士子时文写作的轨范，其选评范围一开始就超越了地域的局限和地缘的牵绊：“大约观地之远近，别其文流，积数常多，而取指责少，此《国表》所繇刻也。”（张溥《国表序》）明代万历年间的士人结社，更强调基于地缘关系的群体意识，如薛冈（1561—1640）表述常人的说法，道：“以文会友得称社，故社必于井邑，未闻广之而社海内也。”<sup>[25]</sup>所以太仓士子王士驥（1566—1601）编选时文选

本，就反复宣称是出于推扬“吾党”，即吴地文人的需求，说：“世之谭文者，知有吾吴也。谭吴文者，知有吾党也。吾党之文，实无以逾他邑，而名且冒之。”<sup>[38]</sup>而天启、崇祯年间士子编纂社稿，则往往超越地域的局限，网罗天下群英之文。崇祯六年（1633），罗万藻称：“天下之为社选者众矣，无不合吴、越、楚、闽诸州之士以张之。”<sup>[31](351)</sup>而张溥等人更明言：“同入之道，大在四海”<sup>[17](280)</sup>。因此他们编选《国表》诸集时，便自觉地“广寄乐善，聚四方之业”（张溥《国表序》），四处征集“同人诸篇”（张溥《国表四选序》）<sup>[27]</sup>。

而更重要的是张溥等人对时文选本“因时而异”的明确认识，这成为他们选评时文的重要准则<sup>②</sup>。张溥《历科文针序》认为：“选一代之文与一时之文，指同而为法则有异焉。一时之文，因材区览，不求其全，以意遇之，物相当也；一代之文，立乎当日，接乎后世，非质之备者，天下之人易之矣。”一方面，“文之为名，不可轻受”；另一方面，“科目之说与金石之论，复不相为通”。因此，以“史”的标准选时文与以“文”的标准选时文，二者不可相混淆。而《国表》系列书籍作为天启、崇祯之际士子时文写作的轨范，显然是选“一时之文”而非“一代之文”，所以应“顺时而已”。在这一点上，张溥称许同社韦子寅《历科文针》一书的编选合乎准则：“一科之内，有其人与否，则几于无之矣；即人之与于选者，其文备与否，则亦几于不备之矣。”<sup>[17](127)</sup>

时文风气因时而异，因此，时文选本在坚持“人无滥登，文无妄予”的选文标准的前提下，也应与时俱进。张溥《娄东应社序》说：“文字之出，势不一辙，要取同原而止。或昔之所造，而今以为非；或今之所造，逾时而即悔其失。学人之见，日新无疆，安在其有定旨乎？时进时退者贤人也，无进无退者圣人也。今天下安有无进无退之人哉？亦于时进时退之间，慎其所造而已矣。”<sup>[17](341)</sup>

《国表》系列书籍从初集到四集的编选，历经七八年，时文风格并非一成不变，唯有“读书行道”的本旨是坚持不渝的，这就是“取同原而止”“慎其所造”的意思。在《国表四选序》中，张溥说：“《国表》之初，英文骈聚，声光外流；继尚老成，一归简朴。或者疑功名盛衰之会，兆见于斯，不知物无常贵，时无常美。当事方萌芽，诋呵众多，道不因诋；及物望既盛，随声称妍，四海顺流，势不加长。是故或因排抑而益高，或繇赞助而见短，毁誉变化，皆非本情。我所可信者，读书行道，不为升降而已。”

总之，强调“人无滥登，文无妄予”，遴选“被人

伦之誉者”之文,坚持“尊经复古”的为文宗旨,从而彰显“读书行道”的本旨,这就是《国表》系列书籍一以贯之的选评标准。

#### 四、“经生家莫不善之”:《国表》系列书籍的传播效应

与天启、崇祯年间流行的其他时文选本,如艾南英《皇明今文定》《皇明今文待》,杨廷枢、钱禧《同文录》,陈名夏(1601—1654)《国朝大家制义》等,旨在提供科举考试文章的蓝本不尽相同,《国表》系列书籍并非仅作为应试文章的后学津梁,而是有意识地作为声气相通的“同人”媒介。

如前所述,张溥等《国表》系列书籍的选评,始终坚持“人无滥登,文无妄予”的选评标准(张溥《国表四选序》),以彰显《国表》系列书籍“应制之途,同人之义”的基本性质(张溥《国表序》)。因此,《国表》系列书籍的传播,便在“同人之义”标榜和“应制之途”的疏通两方面,为张溥等士子赢得响亮的声名,从而取得显著的文化效应。

清顺治年间,吴翱的女婿计东(1625—1676)致书吴伟业(1609—1672),说:“当时纷纷社集文字,若《南彦》《天下善》《人文聚》诸书,与复社之《国表》一集、三集、四集颇相齟齬。”<sup>[28]</sup>《国表》系列书籍之所以与其他时文选本,包括复社中人编选的时文选本“颇相齟齬”,首先是因为张溥等人“于制举义别芟订以行世,颜曰《表经》,曰《国表》,昭本志也”<sup>[5](600)]</sup>。《国表》这一名称鲜明地揭示出,凡入《国表》诸集的士子必标榜特出的“同人之义”,即其人端正,其文醇雅,堪以“表正四国”<sup>②</sup>。而人品端正,文品醇雅,正是张溥等人孜孜以求的士子风范。

王炜相当准确地指出,对“同人之义”的标榜,成为应社、复社诸人自觉的“群体意识”。据统计,“同人”一词在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中至少出现过15次,在张采《知畏堂诗文存》中至少出现过19次,在陈际泰《己吾集》中至少出现过18次,在刘城《峯岫诗集》《文集》中至少出现过11次。而张溥等人所说的“同人”,是在万历年间士子形成的“同文”“同授”“同赏”的意识上,进一步确立的“同业”“同心”的关系,强化士子之间在日常人际关系之中的认同感<sup>[27](204—210)]</sup>。

正如张溥所说的:“复社既兴,鱼山(熊开元)实主斯文之选,酌之群言,弘奖气类,余又以庆同盟之有归也。”(《国表序(代张受先)》)张溥等人明确地认定,他们选评的《国表》诸集实为“同人之选”<sup>③</sup>,表达“同

人之义”(张溥《国表序》),即在写作、编选、阅读、品评时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共同的或相近的人文取向和价值观念。《国表》系列书籍的传播方式,包括征文、选择、编纂、评点、刊刻、发行、阅读,不仅借助于“以文会友”的“社稿”形式,在组织结构上形成并维系了一个未中式士子的共同体,从而交织成一种虚拟的公共交往网络,更重要的是以人品端正、文品醇雅的文化追求,在精神趋向上缔结并强化了足以“表正四国”的士子风范。

在晚明社会中,《国表》系列书籍的传播在彰显“同人之义”的同时,还广泛而深入地传扬了入选士子的声名,对士子“应制之途”的疏通起到独特的社会效应。

在明代,生员已经可以享受各种身份特权,而且还有可能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或经由荐举、捐纳、出贡而出仕,由此步入仕进之途,从而得到更多的社会特权。因此获取、保有生员的身份,以及由生员而获取乡试或步入仕途,就成为明代士子一种基本而重要的人生追求,他们甚至不惜为之拼搏终生。到了明末,生员已从绅士层中游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独立的社会阶层<sup>[29]</sup>。而生员数急剧增加,科举录取率却基本保持不变,廪生、贡生也保持固定限额,这就使生员仕进的难度相对增大<sup>[30]</sup>。这一现状,不能不大大加剧明末士子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担忧,从而激发他们强烈的“身份焦虑”。在这种日渐逼仄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文社的结合与“社稿”的选刻,无疑为明末士人开辟出一条较为顺达的“应制之途”,也为他们拓展出一片较为宽广的生存空间。

明代士子要获取、保持或获得生员乃至“书生”的社会身份,不能不倚赖时文写作。张溥《问奇选序(代)》说:“时文者,士人之嵩少也。虽有燻鬲之才,渊通之能,非此则径无繇达。”<sup>[17](169)]</sup>而尚未中式的士子缔结文社,其主要活动和重要目的,就是研习举业,编订“社稿”,标榜声气,以期更为便捷、更为顺畅地在科举社会中赢得应有的声誉,进而赢得希冀的晋升。所以,崇祯十年(1637)江南学政倪元珙上疏说:“夫结社会友,乃士子相与考德问业耳,此读书本分事”<sup>[7](169)]</sup>。钱谦益(1582—1664)谈到晚明社会生态时就说:“结社会文,原为经生应举而设。”<sup>[31]</sup>叶梦珠(1624—1704?)说到“启、祯之际,社稿盛行”时,也强调:“后生一经品题,便作佳士。”<sup>[32]</sup>

由于《国表》一书详列入选者的姓氏,实际上成为一份按府州县分列的“诸生名录”,在各府州县主持各级科举考试的学官,便可以“按图索骥”,凭借这一“诸生名录”,考校与选拔人才。于是,在各级科举考

试中，列入《国表》的士子，显然就比未列入《国表》的士子，更容易脱颖而出。《复社纪略》卷上记载《国表》二集的社会效应，说：“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文艺俱斐然可观，经生家莫不尚之，金闾书贾由之致富云。”（页673）据统计，至明亡止，复社中共252人进士及第，《国表》系列书籍的广泛传播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sup>[33]</sup>。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诸生征文汇选”的“社稿”，《国表》系列书籍专门选评未中士子的时文作品，因此较之“程墨”“房选”“行卷”等其他各种时文选本，入选作者更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也更具有“平民性”。因此，它们的广泛传播，便足以成为维护和提升入选士子独特社会身份的有效凭借。

《国表》初集的编纂与传播，就传递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信息，即“以文会友”：“《国表》之文，天下之所予也。习其读而知其传，不必其人之与乎社也，接文而有朋旧之遇，则其志应之矣。”（张溥《国表小品序》）杜登春在谈到明末文社时也说：“明季诸公本是名，以立文章之帜，建声教之坛，其亦取诸治田者之通力合作、守望相助已尔，取诸香山耆英之不论贵贱、不拘等夷、同事于笔墨讨论之间已尔。”<sup>[6](458)</sup>

在传统的等级社会中，相对于其他人伦关系，朋友关系是较为平等的。朋友之间以共同的目标、理想及利益为底蕴，以关怀、信任、忠诚等情感为纽带，形成一种类似于血缘关系而超越于血缘关系的友谊。明末士人在结社、选文的广泛交游中，结为朋友，通过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的文化资源，足以获得极其丰富的社会资本<sup>②</sup>。这些社会资本的获取，可能改善或正在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

《复社纪略》卷上说得明白：“社事以文章气谊为重，尤以奖进后学为务。”<sup>[7](643)</sup>时文作品得以录入《国表》系列书籍的士子，既然皆为“同人”，在科举社会中自然应该互相照应，互相提携。吴伟业《复社纪事》记载：“先生（张溥）性好士，穷乡末学，粗知好古工文，辄许与不置口，赖其奖擢成名者数十百人，台使者视所言以为取舍，以此附丽者众。或稍乘其气，凌籍于人，而士之不见齿录者，多褊心不能无望。”<sup>[7](601)</sup>

《复社纪略》卷上记载：“而（张）溥奖进门弟子，亦不遗余力，每岁、科两试，有公荐，有转荐，有独荐。……所以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之子弟入社。”<sup>[7](638-639)</sup>

作为可以“按图索骥”的“诸生名录”，《国表》系列书籍也不免授人以柄，成为异己者赖以攻击的利器。崇祯七年（1634）会试，榜发，首辅温体仁（1573—1639）、太常少卿薛国观（？—1641）“以其《国表》姓

氏查对，见中式者多出复社”<sup>③</sup>。次年（1635），温体仁疏议废科目、行保举<sup>[7](649)</sup>。保举命下，复社主盟闻讯，聚集同人说：“若止行科举，吾等三年始得一出身；若保举，可岁岁登进矣！”于是“传示各邑社长，推择经济博达之士，能兴道致治者，与才力智术，能排斥异己者，汇造一册”，以致“吏部开选保举人员姓名，（蔡）奕琛取复社党目查对，反居大半”<sup>[7](649)</sup>。《国表》诸集所刊载的士子名录，居然发生了如此奇特的政治效应，这也许是张溥、周鍾等人始料所未及的。

## 五、结语

《国表》系列书籍随着复社的初起而出现，随着复社的壮大而兴盛，随着复社陷入低迷而停刊，前后持续了七八年时间。崇祯九年至十年（1636—1637），太仓州监生陆文声夤缘温体仁、蔡奕琛，疏告张溥、张采等，复社之狱踵兴<sup>[7](657-664)</sup>，于是《国表》停止编选刊刻。

《国表》系列书籍以选评、结集、刊行时文的方式，鲜明地标识了晚明士子所形成的民间性的文人团体——文社的特殊性质。清初黄宗羲（1610—1695）说：“集士子私试之经文而刻之，名之曰社，其事至浅显也。……然同社者，从邮筒而致其姓氏行卷，东西南北之人，顾不必相见也。”<sup>[34]</sup>征集和刊刻时文，成为文社的组织基础、关系纽带和实体表征。文社的民间性，实际上由“以文会友”得以体现，借助于“集士子私试之经文而刻之”的“社稿”的民间性，得以彰显于世。

因此，像《国表》系列书籍这样的“社稿”，便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面貌，成为当时文化权力下移总体趋势的重要表征。

就选评者而言，以未中式的生员或举人为主体。罗万藻称赞《国表》诸集的选评，“欲其以议论为救也，舍庙廊而私山林之权”，“其道弥振，其风弥厉”<sup>[3]</sup>。在明末，科举社会中的衡文之权从官方下移到民间，从学政下移到士子，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艾南英说：“今天下文章之柄，上自宰执、侍从，下至州县长吏所取士，有乡会墨卷，有十八房书，又有提学使府县小试之牍，然士子所宗仰，稟以为是非，必曰某墨选、某房选、某考卷选，观其去取，朝夕而置之几案。然则今天下之为选政者，以草莽而操文章之权，其转移人心，乃与宰执、侍从及提学使等。”<sup>[35]</sup>《国表》系列书籍的选评者恰恰是这股历史潮流中的“弄潮儿”，甚至引领了这股历史潮流。



就选评对象而言,以未中式士子的时文作品为主。张溥《三科文治序》说:“房书既尽,而社文踵兴”<sup>[36]</sup>。任源祥(1618—1675)引述其父之语说:“迨于风气之变,文体错出。第一人未必足以服天下,而房稿盛矣;进士未必尽足以服天下,而社稿盛矣。”<sup>[37]</sup>时文的优劣并不以科考中式与否来衡量,因此选评未中式子的时文便足以独标风采。《国表》诸集旨在征集士子崇尚“古学”的时文作品,加以选评,着力体现鲜明的民间性特征。如黄宗羲回忆道:“钱禧,字吉士,苏州人。每刻社稿,必遣使至余家。余知其崇尚先辈,不以平日之文应,拈题别作数首,吉士嗟赏。”<sup>[38]</sup>

就选评效应而言,“社稿”的选评足以激荡或转移一个时代的文风。陈弘绪描绘天启、崇祯年间时文风尚的变迁,说:“数科以来,房选如予友受先、天如、介生、千子、惟斗、伯宗、公亮、尔公诸君子,各有明道匡俗之功,前此所未有也。繇是缝掖咕哔之儒,不以一日进取之牍为准,而以诸君子丹铅之业,晨哦夕诵。选者之权,遂足以夺主司之势。吁,盛矣!”<sup>[39]</sup>黄宗羲指出,万历中期以后,房选盛行,“一科之风气,一科人自成之也”。而启、祯以后,为“厌世日”,选家“行求于溷落不偶之老生,取其火燹墨污之弃物,薰沐之以时贵之名”,“则今日所谓风气者,选家之风气,非场屋之风气,明矣”<sup>[40]</sup>。《国表》系列书籍这样的“社稿”,具有“总纽风物”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sup>[17](135-136)</sup>,不能不为世人所重。黎遂球明确地说,编选未中士子的时文选本,“明其教以告之天下之人:夫既放弃其人,而不得不用其文,则必将因其文而终用其人。吾辈亦当龟勉忠孝节廉之行以待之而可耳。”因此,他高度肯定“吾辈窗文之权”胜于“房书”<sup>[41]</sup>。

综括而言,《国表》系列书籍作为时文编选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社稿”,以未中式的生员或举人为选评主体,从而强化选评家与“庙廊”相对立的“山林之权”<sup>[3]</sup>;以未中式士子的时文作品为选评对象,从而彰显社稿与房书不同的“窗文之权”;以“尊经宗古”的宗旨为选评,从而标榜“非场屋之风气”的一代文风。明末士子“以草莽而操文章之权”,“选者之权,遂足以夺主司之势”的文化风貌和文化形象,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其鲜明的身影。

#### 注释:

① 明人常在这一意义上辨析“时文”与“古文”。如王世贞(1526—1590)《东璧遗稿序》云:“夫自国家设为四端以试公车士,而其最近理而远格者,莫如经书义。自经书义名,而文别为古

今。若论而表而策,则亦古文辞之属耳,士又日降其格以傅于经书义,总而名之曰‘时’,而倍于古益远矣。”见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七,《明代论著丛刊》第一辑影印明万历年间刻本,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3275。

- ② 张采《具陈复社本末疏》云:“我朝制科取士,因重时文,凡选乡、会中式文曰‘程墨’,选进士文曰‘房书’,选举人文曰‘行卷’,其诸生征文汇选曰‘社稿’,从来已久。”张采:《知畏堂文存》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1册影印清康熙间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527。
- ③ 崇祯年间,陈际泰曾极言民间时文选本之多,云:“今天下财用乏绝,但禁刻十八房与天下大小社稿,钁直、墨直、纸直,可得十万而赢,而取天下之刻文,便可塞今日常山缺口。”陈际泰:《己吾集》卷三《杨子常全稿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册影印清顺治间李来泰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617。
- ④ 生员亦称诸生、庠生、博士弟子员等,俗称秀才,种类繁多。参见陈宝良:《明代学校生员的别称与种类》,《中州学刊》2003年第2期,92-96页。
- ⑤ [日]井上进:《复社姓氏校录附复社纪略》,日本京都《东方学报》第65册,1993:629,637。此本校勘相当精核,故本文凡引《复社纪略》,均出此本,随文注卷数、页码。按,《复社纪略》作者是否为陆世仪(1611—1672),井上进已称疑,见上文,619页。故本文作“眉史氏”撰。见陈永福:《〈复社纪略〉记事考实及其作者问题》,《文史》2012年第1辑,217-229页。
- ⑥ 张溥著、曾肖点校:《七录斋合集》,济南:齐鲁书社,2015,《国表序》见卷八,162页;《国表序(代张受先)》见卷八,162—163页;《国表小品序》见卷七,140页;《国表四选序》,见卷一五,289页。下文凡引此四篇序,仅随文括注篇名,不注页码。本文征引张溥文章,均据曾肖点校本,随文注卷数、篇名、页码。
- ⑦ 莫真宝:《张溥文学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丁国祥:《复社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王恩俊:《复社与明末清初政治学术的流变》,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王炜:《明代八股文选家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郑永慧:《张溥八股文编选活动考论》,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莫真宝博士论文首次详细讨论《国表》系列书籍的刊刻与评选体例、编选宗旨及其对崇祯朝时文界产生的影响等问题,见52—70页。
- ⑧ 吴伟业:《复社纪事》,《吴梅村全集》卷二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00;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上,629页。此事约是在年十一月或稍后,参见丁国祥《复社研究》,40页。
- ⑨ 参见计东:《改亭文集》卷一〇《上太仓吴祭酒书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08册影印清乾隆十三年(1748)计瑛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96。复社有新、旧之别,见王文荣:《明清江南文人结社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206—210。
- ⑩ 潘耒:《松陵文献》卷一五云:“其(熊开元)所甄拔,皆成名士。旁邑贤隽,闻风景附,大半出其门下,不独吴江一邑也。”《续修四库全书》第541册影印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潘耒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29。
- ⑪ 杜登春《社事始末》云:“《国表》初刻,已尽合海内名流,其书盛行,即戊辰房稿,莫之与媲。”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458。
- ⑫ 吴伟业:《复社纪事》,《吴梅村全集》卷二四,600页。并见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上,629页,此文于“轮蹄日至”后,有“比年而后”四字。
- ⑬ 吕云孚于崇祯元年戊辰(1628)末,到吴江就岁考,熊开元“大奇之,拔以冠军,遂为吴江学生”。吴山嘉辑:《复社姓氏传略》



卷二，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90：29b。“小品”即“小题”。明清科举考试，以《四书》文句命题曰“小题”，以《五经》文句命题曰“大题”，见戴名世《甲戌房书小题文序》、《己卯行书小题序》，戴名世著、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89-90。

- ⑭ 尹山大会的举办时间约为九十月间，见丁国祥：《复社研究》，44页。前引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上名录中，所记参会人员凡“七百余人”，文凡“二千五百余首”，这大约即是《国表二集》的内容。
- ⑮ 张溥《国表序(代张受先)》云：“是社(即复社)已二举矣”，“社集之日，胥闾之间，维舟六七里，平广可渡，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当即是年秋复社尹山大会盛况。此时《国表》初集业已刊刻流行，故此文当为《国表》二集所撰。
- ⑯ 罗万藻《国表序》云：“《国表》之选，于是为第三刻。主之者往往当世之名流，而其举必于礼部进士之后。”罗万藻：《止观堂集》卷三，济南：齐鲁书社，1997：395。据此，此文当为三集所撰，在辛未会试之后。
- ⑰ 张溥《国表四集序》最早收入《七录斋别集》卷二。崇祯九年(1636)六月，张溥刊布《七录斋诗文集》，将此文收入《古文近稿》卷四，改题《国表四选序》。据此，《国表四集》当刊刻于崇祯七、八年间。参见莫真宝：《张溥文学思想研究》，60-61页。
- ⑱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649。关于应社的最新研究，见张涛：《社群联盟格局：晚明文坛的主流文学样态——以应社与复社关系为重点论述复社联盟进程》，《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152-159。
- ⑲ 杨廷枢、钱禧辑评：《皇明历朝四书程墨同文录》封二，明崇祯八年(1635)金周叶聚甫等刻本。参见龚笃清：《明代八股文史》，长沙：岳麓书社，2015：616-617。
- ⑳ 张溥：《房稿表经序》，《七录斋合集》卷七，第147页。黄宗羲《马虞卿制义序》云：“甲子、乙丑间，周介生倡为古学，因尚子书，《繁露》、《法言》，家传户诵。”黄宗羲著、平慧善校点：《南雷诗文集(上)·序类》，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70-71。甲子、乙丑，即天启四年、五年。
- ㉑ 所谓“时文”，原本就隐含着因时而变的涵义。陆符(1597—1646)《时文易题辞》说：“所号为时文者，将以与时浮沉。”黄宗羲选编：《明文海》卷三一〇，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3198。戴名世《宋嵩南制义序》说：“制义者，与时为推移，故曰时文。时之所趋，遂成风气，而士子之奉以为楷模者胥会于一。”《戴名世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113。
- ㉒ 崇祯十三年(1640)，有怨复社者，托名嘉定徐怀丹，制《复社十大罪檄》，攻击张溥等人：“榜示同志之书，前额《名文匡》者，《语》曰‘一匡天下’也；继额《国表》者，《诗》曰‘表正四国’也。无将之心，(张)溥固俨然自命之而无忌矣。”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下，664页。
- ㉓ 张溥《天下善二集序》云：“予往者与彦林、介生诸子有同人之选。”《七录斋合集》卷六，135页。
- ㉔ 所谓“社会资本”，参见(美)林南(Lin, N.):《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9-25。
- ㉕ 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上，第642页。同书卷下又云：“甲戌会榜发，(蔡)奕琛以《国表》姓氏查对，见新进士多出社局，大异之。因思变取士之例，以禁其将来，且可进其私党。”(648页)记载异辞，可备一说。

## 参考文献：

- [1] 郎瑛. 七修类稿：卷二四 辩证类[M]. 上海：上海书店，2009：66.
- [2] 顾炎武. 亭林文集：卷一 生员论上[M]// 华忱之，点校. 顾亭林诗文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3：21.
- [3] 罗万藻. 此观堂集：卷三[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2册影印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跃斋刻本. 济南：齐鲁书社，1997：395-396.
- [4] 罗明祖. 罗纹山先生全集：卷四[M]//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4册影印明末古处斋刻本.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107-108.
- [5] 吴伟业. 复社纪事[M]// 李学颖集评标校. 吴梅村全集：卷二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599-607.
- [6] 杜登春. 社事始末[M]// 台湾丛书集成新编第26册影印《艺海珠尘》本.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458-466.
- [7] 眉史氏. 复社纪略：卷上[M]// 井上进：复社姓氏校录附复社纪略，日本京都《东方学报》第65册，1993：638.
- [8] 丁国祥. 复社研究[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77-80.
- [9] 张采. 知畏堂文存：卷九 祭张天如文[M]//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1册影印清康熙间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661.
- [10] 张采. 知畏堂文存：卷二 杨子尝四书稿序[M]//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1册影印清康熙间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556.
- [11] 杨彝. 穀园集·文·凤基会业序[M]// 清道光三年(1823)谭天成家抄本.
- [12] 张采. 知畏堂文存：卷一[M]//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1册影印清康熙间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527.
- [13] 罗万藻. 陈大士先生传[M]// 陈际泰. 己吾集：卷首.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册影印清顺治间李来泰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592.
- [14] 汪琬. 尧峰文钞别录：卷二 文稿·杨顾两先生传[M]// 笺校，汪琬全集笺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2169.
- [15] 何宗美. 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第六章[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23-504.
- [16] 陈际泰. 太乙山房文集：卷四《新城大社叙》[M]// 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67册影印明崇祯六年(1633)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427.
- [17] 张溥. 七录斋合集[M]. 济南：齐鲁书社，2015：128.
- [18] 黎遂球. 莲须阁文钞：卷九 云合大社序[M]// 丛书集成续编第120册影印《广东丛书》第一集本，上海：上海书店，1994：427.
- [19] 吕留良. 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五东皋遗选序[M]// 续修四库全书第1411册影印清雍正三年(1725)吕氏天盖楼刻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50.
- [20] 张溥. 七录斋合集：卷六五经征文序[M]. 济南：齐鲁书社，2015：129-130.
- [21] 黎遂球. 莲须阁文钞：卷九 谢解元窗稿序[M]// 丛书集成续编第120册影印《广东丛书》第一集本，上海：上海书店，1994：433.
- [22] 刘城. 峰桐文集：卷三癸酉程墨选序[M]// 四库禁毁书丛

- 刊·集部第121册影印清光绪十九年(1893)养云山庄刻本.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 408. 此文撰于崇祯七年甲戌(1633).
- [23] 黎遂球. 莲须阁集: 卷一九 万徵君茂先传[M]//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3册影印清康熙间黎延祖刻本[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 274.
- [24] 罗明祖. 罗纹山全集: 卷四[M]//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4册影印明末古处斋刻本.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 107-108.
- [25] 薛冈. 天爵堂文集: 卷二海内名公广社序[M]//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5册影印明崇祯间刻本.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8: 471.
- [26] 王士骥. 中弇山人稿: 卷四续行素编稿序[M]//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2册影印明万历间刻本.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 6.
- [27] 王炜. 明代八股文选家考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206-207.
- [28] 计东. 改亭文集: 卷一〇 上太仓吴祭酒书一[M]// 续修四库全书第1408册影印清乾隆十三年(1748)计瑛刻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96.
- [29] 陈宝良. 明代生员及其相关概念辨析[J]. 浙江学刊, 2003(1): 172-177.
- [30] 陈宝良. 明代生员层的仕进之途[J]. 安徽史学, 2002 (4): 2-10.
- [31] 钱谦益. 遵旨回话疏[M]// 钱曾笺, 注, 钱仲联, 标校: 牧斋初学集: 卷八七,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1821.
- [32] 叶梦珠. 阅世编: 卷八“文章”条[M]. 来新夏, 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183.
- [33] 王恩俊. 复社成员登科表[M]// 复社与明末清初政治学术的流变附表一.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3: 267-281.
- [34] 黄宗羲. 钱孝直墓志铭[M]// 吴光, 校点. 南雷诗文集(下)·南雷杂著稿, 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 47.
- [35] 艾南英. 天佣子集: 卷九 甲戌房选序(下)[M]//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本: 310.
- [36] 张溥. 七录斋合集: 卷七 三科文治序[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5: 140.
- [37] 任源祥. 鸣鹤堂文集: 卷四读墨小序[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册影印清乾隆十一年阳羨任氏刻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83.
- [38] 黄宗羲. 思旧录·钱禧[M]// 黄宗羲全集: 第一册.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358.
- [39] 陈弘绪. 陈士业先生集·石庄初集: 卷四甲戌房稿辨体序[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54册影印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 济南: 齐鲁书社, 2001: 293. 此文撰于崇祯七年甲戌(1634).
- [40] 黄宗羲. 冯留仙先生诗经时艺序[M]// 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南雷诗文集(下)·序类》.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 40-41.
- [41] 黎遂球. 莲须阁文钞: 卷九 国门广业序[M]// 丛书集成续编第120册影印《广东丛书》第一集本, 上海: 上海书店, 1994: 425.

## Selections of commentaries on fashionable prose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ir reputation in late Ming literati: A case study on the book series of *Guobiao* edited by Zhang Pu and others

GUO Yingd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From 1628 to 1634, Zhang Pu (1602-1641) and others edited *Guobiao*, a selection of fashionable articles at that time, and successively published four series, which constituted a book series of *Guobiao* together with *Guobiaoxiaopin*. The book series, either in the number of authors and articles chosen and covered, or in the width and depth of the dissemination, served as a paradigm of the literati's "shegao (fashionable prose written in a particular literary society)," guiding us to enter the historical site of the late Ming literati's selections of and commentaries on fashionable prose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ir reputation, and to investigate their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styles. By exploring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selectors and commentators, the criteria of selections, and the effects of dissemination of the book series of *Guobiao* edited by Zhang Pu and others, the present essay demonstrates from one aspect the late Ming literati's activities of selecting and commenting on fashionable prose, as well as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Keywords:** fashionable prose; literati; the edition of selections; the Fu Society; Zhang Pu

[编辑: 谭晓萍]